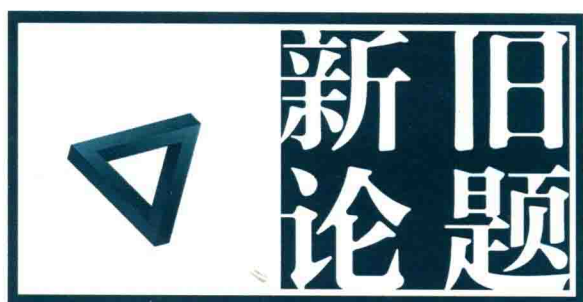




——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化经典问题再讨论

卢燕娟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人民出版社

新旧 论题

——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化经典问题再讨论

卢燕娟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旧题新论：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化经典问题再讨论 /
卢燕娟著. — 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8

ISBN 978-7-5300-0385-5

I. ①旧… II. ①卢…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史—研究②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史—研究 IV.
①I209②G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51592 号

旧题新论

——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化经典问题再讨论

JIUTI XINLUN

卢燕娟 著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120

网 址：www.bph.com.cn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建宏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本 10.25 印张 135 千字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00-0385-5

定价：4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本社负责调换

质量监督电话：010-58572393



卢燕娟，女，1979年生，云南人，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任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副教授。研究领域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化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北京市哲学社科基金项目各一项；参研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一项。已出版专著一部，发表论文30余篇，多篇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

项目统筹：王忠波 陶宇辰

责任编辑：陶宇辰

责任印制：承伯平

封面设计：京版众谊

前言

鸦片战争以降，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外侮内乱，传统的家国天下分崩离析。从这个历史事实来说，“中国的现代转型”并非学术界凭借主观兴趣选定的热点问题，而是一个世纪以来几代中国人切肤所感的历史经验。这一转型不是家国兴亡、朝代更替，也不是某一个领域、某一种思潮的追新求异，而是一个绵延了数千年的古老文明，在现代世界的边缘所遭遇的掠夺、灾难，所经历的探索、奋斗。这一转型是几代中国人在一个多世纪中，大到天下信仰、家国制度的宏观层面，小到一粥一饭、一丝一缕的日常生活，所切身经历的危机、困惑与改变。一个民族在这样的沧桑巨变中坚守与鼎革、效法与创造，其间的困顿艰辛成就了现代中国历史独特的痛彻深邃。

现代中国的文学与文化本身就是中国历史现代转型的产物。新文学取代古典文学，并不因为古典文学在审美意义上死亡；新文化取代旧文化，更不因为旧文化内在的自足逻辑被击破。现代文学与文化的全部合法性，建立在现代中国转型这一客观历史存在与主观时代的诉求之上。换言之，现代中国的文学与文化本身不是为了创造出超越古典文学高峰的审美作品、不是为了建构起学理逻辑上碾压古典文化的意识结构而存在，虽然在较长时间以来这是进步主义历史叙述的一个基本观点。事实上，将一个民族在一个世纪中所经历的灾荒战火、生死别离，将其为了求生存、求发展所付出的艰苦探索与牺牲奋斗，将其百年所经历的彷徨挫折、经验教训沉淀到诗性文字中、刻绘在艺术画面上、再现于舞台场景中，这才是现代中国文学与文化存在的全部理由——只要中国的现代历史还没有被遗忘，这

一合法性就与之同在，无须自证。从这个问题视野来说，现代中国的文学与文化，与现代中国的历史有着同样的痛彻深邃。

然而在将时间当作离弦箭矢的现代人间，对历史的遗忘往往来得比人们预期得更早、更快，更让人猝不及防。二三十年，甚至十年五年，就已经是一段不短的时间，大可生“恍若隔世”之感。纵然当事人犹在、亲历者未去，往往也众说纷纭，难有信史。1500年前，想用一己之力为北宋重开盛世的王安石曾经有一句诗：“当时黯淡犹承误，末俗纷纭更乱真。”在中国这个充满了“告别”“走向”“开启”的世纪中，这样的黯淡纷纭无论对于历史的剧中人还是观众，也是一种难以言说的痛彻深邃。

本书的11篇论文，从王安石与中国历史转折的关系，到现代理性思想对中国现代历史价值的改写重塑；从被遗忘、被冷落的经典作品，到诗人、到时代转型中的诗歌与作家；从历史转折中的文学现象，到作为大众文化风向标的影视剧、广场文艺，思维触角蔓延之处，每个题目都并不新鲜，基本是这—个世纪中被反复讨论的问题或反复评论的事件，甚至是被认为已有定评、无须再议的问题或事件。而本书书名虽曰“旧题新论”，旧题确实，新论未必。或许无非是数十年沧桑沉浮、人世间斗转星移之后，某些被遗忘、被模糊的“旧事重提”。这些论文与其说是作者近几年的学术生涯中对现代中国文学、中国文化的某些问题的研究，不如说是自己从思想上到情感上越来越困惑的表达。然而，在今天，这样讨论它们，又或许确实是陌生的、不合时宜的。这种陌生感来自中国现代历史的大开大合、大起大落，也来自我们—个世纪的黯淡纷纭中越来越强大的遗忘机制。遗忘是多么快乐的事情，不再背负记忆，也不需偿还债务。可是面对这样的遗忘，当有大困惑与大恐惧。所以，近年来，笔者一直用一种不合时宜的姿态与情感，希望自己的学术研究能带着温度去抵抗遗忘。

在《百年孤独》中，大屠杀唯一的幸存者在死里逃生之后，他所讲述的真切记忆被所有人判定为胡言乱语。马孔多的人们在一夜之间患上失

眠症，伴随而来的是记忆的消失和恐惧的弥漫。在吉普赛人的帮助下，他们才得以如同庆祝重生般庆祝重获记忆。对与现代中国一样也置身于布罗代尔的世界时间之外的拉丁美洲，加西亚·马尔克斯或许就是这样抵抗遗忘的吉普赛人。他站在诺贝尔奖的领奖台上说：“最大的挑战是无法用常规之法使别人相信我们真实的生活。朋友们，这就是我们孤独的症结所在。”现代历史中，不是每一个民族都是走进现代的。那些从家园的废墟中爬进现代、从同胞的尸骨中滚进现代、被鞭子抽进现代、被大炮轰进现代的民族，都应该能读懂马尔克斯的现实主义，绝不魔幻，如此孤独。

抵抗孤独的唯一办法是抵抗遗忘。本书的每一篇文章都是严格按照当下学术规范写作的、在冰冷的逻辑中进行抽象思辨的学术论文。不揣浅陋成册，若能得到前辈方家从学理上的批评指正，将是笔者莫大的荣幸。若可奢望，则有知音者，或能见其痛彻孤独？

本书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一般项目《百年文艺中的“家国”关系变迁——以“五四”至今的文艺为对象》（立项编号16BA014）和中国政法大学优秀青年教师培养支持计划资助项目的阶段成果。

卢燕娟

2018年7月9日于英国杜伦大学

目 录

文学研究部分

“历史的精神”与中国的现代

- 抗日战争时期历史剧再讨论····· 003

独特的“早晨”

- 《上海的早晨》再解读····· 016

再谈政治与诗歌

- 以贺敬之的政治抒情诗为对象····· 031

美学与意识形态之辩

- 再谈朦胧诗的理论问题····· 043

- “路遥现象”与文学史中的“农民”问题····· 059

文化研究部分

- 从熙宁变法论中国历史中的理性法制诉求····· 077

- 从宋慈形象的流变看法治对现代文化的选择和重塑····· 090

“为穷人能读书”与“为人民创造新文化”

- 再讨论电影《武训传》及其引发的争议····· 103

晚清的终结与现代中国的开端

——从电影镜头中“晚清故事”的流变看历史意识

形态的演变····· 116

论当下电视剧的公式化与概念化问题····· 129

和解、反思、征用与新的可能性

——再论“唱红歌”及其引发的争论····· 140



文学研究部分

“历史的精神”与中国的现代

——抗日战争时期历史剧再讨论

“历史剧”在现当代文学中通常指当代剧作家以历史内容为题材创作的话剧或戏曲。20世纪40年代，中国出现了历史剧（主要是话剧，也包括延安的新京剧，本文重点讨论在当时影响更广泛的国统区话剧）的创作和演出热潮，并引发了争论。当时和此后的讨论，一部分从政治角度根据各自的立场出发，将其作为党派政治之争在文艺上的呈现和延伸；另一部分则立足艺术角度，探讨当代人是否可以根据现实政治的需要重新编排历史故事、重新编排的原则是什么。从深层来说，后一角度仍是前一角度的继续：重新编排的原因往往被指认为政党政治的需要，对其可否，表面看取决于是否赞同以历史服务于现实政治的文艺标准，实质上往往指向对剧作背后的政治立场的态度。近几年，亦有学者开掘这些历史剧中的人文关怀等因素，致力突破党派政治视角，从人性角度为抗战历史剧寻求新的阐释空间。^①

在上述讨论的基础上，本文注意到另一个更重要的时代因素——当时中国正处在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华战争堪称中国现代历史上最严峻和全面的危机，而抵御这场危机的过程不仅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格局，也深刻影响了现代中国的文化道路，使中国从面对现代西方文明之初一度迷失的状态中有所反思，认识到现代西方文明中所蕴含的野蛮和残酷，反拨晚清以降日益占据主流的民族失败主义，重新认识自己民族的历史。

^① 参见解志熙：《历史的悲剧与人性的悲剧——抗战时期的历史剧叙论》，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年第2期。

史和文化。这种重新认识发生在中国整体性的现代追求中，从客观可能性和主观诉求来说都不是一场复古运动，而是中国现代文化道路的一次重要选择。其一，它指向中国争取独立、走向现代的最终目标；其二，它也内蕴着在现代历史进程中重新选择、阐释传统的必然要求，国族认同的重塑本质上包含民族历史传统的自我更新。

从这一视角出发，则该时期影响最大的一批历史剧基本都内在于并参与其中。这批历史剧主要包括郭沫若的战国题材剧、阿英的晚明三部曲和欧阳予倩、阳翰笙等一批重要剧作家以明清兴亡、太平天国等历史事件为题材创作的一些话剧。这些历史剧在当时影响非常广泛，在今天的文学史叙述中仍然被作为当时历史剧创作的最主流代表。

一、历史精神的回归

——抗战历史剧的精神资源

无论是古为今用还是借古讽今，抗战历史剧首先体现出与启蒙思想不同的文化选择，即不再视中国固有的历史文化为现代中国的重大阻碍，也不再以西方民主自由作为现代中国的核心价值追求，而是转向从自己民族的历史中寻找精神资源，以克服当代危机、重建现代国家。

这一转折具体体现为三个层次：一是从自己历史中寻找可以鼓舞当代抗战的民族英雄故事；二是让历史人物表现“历史精神”，“五四”以后一度受到否定的传统道德重新获得肯定；三也是更重要的是这一肯定立足于传统道德在促进现代中国的独立和崛起进程中的积极作用上，并在此基础上将其整合为中国走向现代的内驱力。

比较郭沫若在五四时期和抗战时期的历史剧创作及这些创作引发的争论，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转折。

五四时期郭沫若创作了“三个叛逆的女性”：《卓文君》《王昭君》《聂嫈》。用郭沫若自己的话说，是“借古人的骸骨来，另行吹嘘些生命

进去”^①。几个历史剧共同呈现出启蒙文化的主流价值判断：将中国传统道德与西方启蒙精神作为两套对立的价值体系，启蒙精神追求的自由平等代表了现代世界文明，是正面价值；而中国传统道德则因为阻碍了自由平等的启蒙追求而成为负面价值，是中国“走向现代”的根本阻碍，需要彻底抛弃。在这几部剧中，女主人公们的衣服是中国古代的，精神气质上却完全接受了启蒙思想，满嘴“人的尊严”“生命的自由”等新名词。这些古装女子在剧中的意义正在于通过批判和克服她们身上服装所属的历史和文化体系，实现追求个体自由和解放的新文化理想。卓文君“在家不从父”，是将“孝道”视为对个人情感和生命自由的束缚；王昭君不仅是“出嫁不从夫”的新女性，更在对个体生命自由的追求中颠覆了作为中国传统道德核心精神的“忠君”要求。

抗战时期，郭沫若提出要“把握历史的精神”^②，其历史剧的主题精神发生转变，即从个体意识上升到国族意识，从追求个性解放到思考民族命运，代表作是《屈原》《虎符》《棠棣之花》《高渐离》《南冠草》等。“历史的精神”在郭沫若的创作中是一个复杂的概念，但其无疑包含着从西方启蒙精神的移植到对中国历史的重新发掘的转向。这一转向在剧作中具体体现为以下三个层次。

第一，着力于塑造在中国正统历史叙事中被肯定的英雄。五四时期，郭沫若选择的历史人物原型都与中国正统历史价值观有所疏离，卓文君、王昭君在中国历史上主要以风流佳话中的“佳人”形象存在，聂嫈可以纳入“舍生取义”的序列中，但郭沫若在剧作中很大程度地去除了正史叙事中的价值而重新创造了她追求生命自由的启蒙价值。到了抗战时期，

① 《孤竹君之二子·幕前序话》，载《创造》季刊第一卷第4期。

② 参见郭沫若：《历史·史剧·现实》，见《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419—422页；郭沫若：《我怎样写〈棠棣之花〉》，见《郭沫若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72—279页。

郭沫若以浓墨重彩的笔调、高昂悲怆的风格塑造了屈原、信陵君、高渐离、夏完淳这些在中国传统历史叙事中被称为“忠臣义士”的主流英雄形象。

第二，剧中英雄主要宣扬了中国传统核心价值的“忠、孝、仁、义”精神。比较五四时代通过反传统以追求个性解放的英雄形象，显然“英雄”的判断标准发生了颠倒性的置换。《屈原》歌颂对祖国之“忠”，《南冠草》强调夏完淳“忠于故国、舍生取义”的忠义气节，而《虎符》则赞颂信陵君保国护民、扶危救困的大忠、大仁与大义。其中，《聂嫈》和《棠棣之花》的前后变化最能体现出这一从“五四”到抗战的转变。这两个剧作讲述的都是“聂政刺韩相、聂安取义”的故事，但“取义”的原因发生了变化。在《聂嫈》中，作者借酒家女阐释聂氏姐弟取义的意义是为了反抗“我们的血汗成了他们的钱财，我们的生命成了他们的玩具”的世界，他们是追求平等、自由和尊严的个性解放先驱。到了《棠棣之花》中，作者仍借酒家女之口，将“取义”的意义阐释为对国家、民族庄严的责任感，其主题曲反复吟唱“自由之花，开遍中华”，一方面是为了应和抗战需要，但另一方面，其对“自由”的理解也远远超出了五四时代“卓文君”们追求的个性解放、婚姻自由的意义而扩展到对天下苍生的生命自由的追寻中。这一责任感的根基乃是对祖国之“忠”、对父母之“孝”、对天下苍生之“仁”和对朋友之“义”，聂氏姐弟在这一剧中因为展现了这样的“忠、孝、仁、义”而成为民族英雄。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这些历史人物以及他们的“忠、孝、仁、义”精神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获得重新肯定的原因，是因为剧作家相信他们在现代中国反侵略、求独立的战争中能够发挥强大的动员和凝聚力量。换言之，对传统的重新肯定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认为中国历史传统文化并不像启蒙文化判断的是中国走向现代的重要阻碍，相反，其在克服现代危机和建构一个独立强大的现代国家中能够发挥巨大的正面作用。中国传统

文化的历史合法性与现实合理性在这一认同中紧密结合,成为中国走向现代的内驱力。

二、时代精神的转变

——抗战历史剧体现的时代思潮

需要指出,当时的历史剧创作者不仅有郭沫若一人,反响较大的作品还有阿英的晚明三部曲、欧阳予倩的《桃花扇》等。这些作品均致力塑造自己民族历史中的民族英雄,并从中发掘忠于故国、威武不屈、富贵不淫的民族传统精神。而这样的作品也反映并推动当时的社会思潮和舆论风向发生了重要变化。五四时期,即使像“三个叛逆的女性”这样旨在批判传统道德以宣扬启蒙的作品,仅仅因为选取了历史题材就被一些激进的人指责为“故纸堆中讨生活”^①。但到了抗战时期《屈原》《棠棣之花》等剧的公演,不仅突破了五四时代受众狭窄、与大众隔阂的“小剧场”规模,引起全国性的轰动,更重要的是当时舆论,无论是国民党方面的严厉批评,还是共产党方面的热烈肯定,都基本是从政治立场出发^②,而对这种回归历史精神以寻找国族反抗侵略、走向现代力量根源的做法并无异议。

上述创作和批评的转折不是一个文艺内部的孤立现象,它呈现出的是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一个整体性的重要转变。

从晚清开始,经五四启蒙运动到抗战,中国思想和文化界对历史文化的态度经历了由“全盘否定”到“重新正视”的转变。这个转变与当时知识精英对“如何改变中国之命运”的探索是同步的。鸦片战争对现代中国

^① 参见田本相、杨景辉:《郭沫若史剧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5页。

^② 当时,张道藩推出陈铨的话剧《野玫瑰》,被视为为汉奸树碑立传、鼓吹投降;而潘公展也曾经因为上演郭沫若的话剧而对文化界人士破口大骂。周恩来亲自领导的《新华日报》则大量刊登赞扬《棠棣之花》和《屈原》的文章,周恩来观看并保存了两个戏的全部剧照。具体情况参见田本相、杨景辉:《郭沫若史剧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